

曾被张元济关注的一部抄本 《读史方輿纪要》

刘 应 梅

《读史方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用毕生精力写就的一部历史地理著作。由于顾祖禹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纪要》一书在编撰动机与表现内容上的独特意义,这部輿地巨著的版本流传情况也格外引人关注。

笔者在参与整理《嘉业堂藏书出售信函》时,在《张元济书札》所收张元济致顾廷龙的一封信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东方提出所谓善本最后一批中有《读史方輿纪要》抄本七十册,卷端粘有黄仪与□□先生一笺,定非寻常抄者。已请馆中检出最前十册送上,乞与□兄审定。是书稿本一时有无异同?如须续阅,尽可属其全送。鄙意拟请吾兄撰一序文,俾此两书可以相得益彰也。”^①由于笔者此前已了解到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藏有多部抄本《纪要》,因而对张元济所提到的这部有黄仪短笺的抄本《纪要》及其特征产生了兴趣,并及时与馆藏的《纪要》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国家图书馆所藏一部七十册抄本《纪要》,卷前正有张元济所说的黄仪信笺。惊喜之余,立即对这部抄本《纪要》的版本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分析,现将初步认识简要归述如下。

一、黄笺本《纪要》的基本情况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附有黄仪短笺的抄本《纪要》(以下简

称黄笺本），共一百三十卷，七十册。卷首有魏禧、彭士望等人的序，正文为历代州域形势，直隶、江南两京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十三布政司的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险要等内容，又专叙河流和全国的分野。除了书后没有附录《輿图要览》外，卷数的构成，与一般所见各种版本的《纪要》并无多大区别。但细观其书中内容，则可以发现它所具有的许多独特之处。

国内近些年研究《纪要》成就较为突出的施和金先生，曾对照上海图书馆所藏《读史方輿纪要》原稿本胶卷，校读了通行的各种刻本的《纪要》。结果发现，以嘉庆十六年四川龙万育敷文阁本为代表的各种刻本，存在着四五百处文字讹误。施氏在《〈读史方輿纪要〉校正举要》、《关于〈读史方輿纪要〉》、《论〈读史方輿纪要〉稿本出版的价值和意义》等文中^②，还特意列出了几处最明显的讹误。

1、卷七十六湖广黄州府序：各本有“刘昫曰：北齐保于故西陵城西南，别筑小城，置衡州”几句，义不可解。对照稿本，才发现原稿中有“北齐天保二年”，后“天保二年”四字又被圈去，但圈时笔下疏忽，漏圈了“保”字，抄书者不明情理，便出现了“北齐保”的奇文。

2、卷七十七景陵县下：各本皆有“楚景陵邑，汉置县，属江夏郡，后汉因之。又光武封刘隆为侯邑。晋亦曰景陵县，仍属江夏郡。晋末分置霄城县，属景陵郡，宋齐因之。又光武封为霄城侯是也。”霄城县为晋末所置，而汉光武帝居然有封赐霄城侯之事，显然有误。查原稿本，“又光武”三字原作“梁范云”。稿本中“又光武封刘隆为侯邑”与下文“梁范云封为霄城侯”正好双行并列，抄书者也许看窜了行，以致此误。

3、卷一百广东“北据五岭”下：各本有“县周志非则曰：‘五岭之说，旧以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五途耳。’”“县周志非”何指？很难理解。核对稿本，“周志非”原作“周去非”。周去非为南宋学者，南宋淳熙间曾任桂林通判，有人问他岭南之事，他便写了《岭外代答》一书，《纪要》所引“五岭之说”云云，即指此。“周去非”而为“周

志非”，显系形近而讹。稿本中在“周去非”前，还有“详见广西兴安县”等小字注，后又被删去，其中的“县”字删而未尽，使抄书者因此又出错误。

此外，稿本中有几处文字，在敷文阁等刻本中也明显地漏刻了：

1、卷九“汎扫幽燕芟除秦晋”一段中，“舟师步骑夹河而进”之前“克长芦”等十九字。

2、卷三十二曲阜县五父衢条中，“閔诅之五父之衢”之后“又定六年”等十七字。

3、卷六十九四川夔州府巫山县下，“巫山，县东三十里，亦曰巫峡，……余详见名山”一段六十六字。

4、卷六十九四川重庆府璧山县下，“来风驿，县东南五十里，马驿也。……成化以后改今属”一段。

5、卷一百七广西永宁州义宁县下，“桑江，县北八十里，……下流入永福江”一段四十余字。

而查对国家图书馆所藏黄笺本《纪要》，发现除了极个别的细小差异外，其所抄写的文字，与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的内容基本一致。如果说稿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那么这部黄笺本的价值同样也不可低估。而且，稿本在“北据五岭”一段的“始安越城岭五”几字之后，漏掉了“《輿地志》：‘五岭，一曰台岭，即大庾也。’《丹铅录》云：‘台岭之峤在大庾，骑田之峤在桂阳，都庞之峤在九真，萌渚之峤在临贺，越城之峤在始安，盖袭邓氏之说而不知九真之误也’”等文字，直接写作：“杜氏亦曰：‘塞上岭一也’”，义反不可解。黄笺抄本却补上了这段文字。稿本改“国初”为“明初”，“国朝”为“明朝”或“前朝”，“夷”为“彝”，“虏”为“敌”等，显然是为了避清朝的忌讳，而黄笺本则保持了原字，更接近全书的原貌。看来，在某些个别地方，黄笺本比原稿本更可靠。当然，与稿本相比，黄笺本也有一些讹误，如卷六十九重庆府“崇龕废县”条，稿本中“唐武德三年”几字，黄笺

本则作“产武德三年”，显然是抄写笔误。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

除黄笺本之外，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还藏有这样几部抄本《纪要》：彭元瑞手校60册纬萧草堂抄本；钤“曾在李鹿山处”、“知不足斋藏书”、“邢之襄印”等朱印的27册抄本；钤“温陆张氏藏书”朱印的100册抄本；钤“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的96册抄本；钤“辽东陈氏藏书”印章的107册抄本；钤“王云私印”的50册抄本；只有朱笔校字的120册抄本。在上文所列举的几处，各抄本的文字情形或与原稿本接近，或与黄笺本相同。可以说明基本出于同一个底本系统。可见，一味地强调原稿本的地位而忽视其他各抄本的价值，也许是不太科学的。

二、黄笺本《纪要》的递藏推测

上海图书馆所珍藏的稿本《纪要》，是杭州藏书家叶景葵从杭州抱经堂主人朱遂翔手中购得，原稿丛残一束，经过修书人耗时二年的精心修补始成完书，于1941年由叶景葵先生捐赠给合众图书馆。解放后，合众图书馆合并入上海图书馆，此书也随之成为该馆的珍本秘藏。至于在此之前，是由谁保藏的，现在不得而知。只看到在页眉处、字行间，有许多的墨笔校改，而且校改的不止一个人。

笔者看到的这部黄笺本《纪要》，从抄写的笔迹看，显然出自两个以上的书手，但抄写工整，很少有涂抹、圈改和批校，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中的校改之处，在此多为整齐抄录，说明它的抄写时间应该晚于稿本。但是，卷前所粘黄仪的一纸信笺，却这样写到：

大著《读史方輿纪要》稿本七十册，已由传是楼发还，兹特奉上，祈检收，此上，退一居主人著席。弟黄仪顿首 即刻

信中提到的传是楼，指曾经召集顾祖禹、黄仪等人入一统志馆参修《大清一统志》的徐乾学。他是清初的大宦官和大学者，而且热心于延揽宾客、组织学术编纂活动。曾先后延纳万斯同、阎若璩、胡渭、顾祖禹、刘献庭、黄仪等学者，游仕于他的幕府之中，也曾组织

编修《明史》和《大清一统志》，颇得学者们的拥戴和好评。顾祖禹虽然淡于功名，但经徐乾学的坚意邀请，为徐乾学聘入一统志馆参与《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并深得徐氏器重。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輿纪要》书稿完成之后，请徐乾学阅读批正，是很正常的。另据顾廷龙先生《〈读史方輿纪要〉稿本序》，徐乾学在协助纳兰性德刻印《通志堂丛书》时，曾经校刻了《读史方輿纪要》的陕西部分。说明徐乾学当时确实承担了刻印《纪要》一书的任务，但由于某些原因只印了陕西部分就停止了。既然不能全部付梓，就只好将原本璧还。黄仪这里所说的七十册《纪要》稿本由传是楼发还，大概就指这种情况。从信中我们看到，黄仪称对方大著如何如何，那么收信的人就应该是大著撰写者顾祖禹本人，“退一居主人著席”云云，则说明顾祖禹还有一个别号为“退一居主人”。而且，该书每册卷端处都钤盖了“退一居珍藏印”的朱文方印。这似乎进一步证明该书是顾祖禹或其家人所珍藏的。果真如此，那么它的流传价值就应该超出于目前所看到的稿本《纪要》之上。但《张元济书札》中张元济给顾廷龙的信却称黄仪写信的对象为“□□先生”，是因为张元济原信字迹不清无法准确释读？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不过，从信笺的格式和称谓看，收信者“退一居主人”就是撰写《读史方輿纪要》者，即顾祖禹。

根据以上的内容比较和卷前粘附的黄仪短笺的情况，基本可以断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抄本《纪要》就是张元济致顾廷龙信中所说的那一部。黄仪他处的真实笔迹现在虽然没有见到，但该书卷前所粘黄仪信笺的字迹清晰，笔画流畅，看不出模仿痕迹，不会是出自摹仿和造伪之手。在这部抄本《纪要》的第一册扉页上，还过录了《无锡金匱县志》卷二十一“儒林传”中关于顾祖禹的传记内容，文末有“光绪四年六月十六日邑后学林庚敬录”的落款，这页文字的墨迹明显新于全书其他部分，说明过录应在原书抄就之后。这或可说明此书曾被林庚收藏，或者曾在与林庚相关之人手中。

各种材料记载,东方图书馆藏书在1932年1月28日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火海化为灰烬,此后,张元济等人仍试图予以恢复,并于1933年组成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陆续买进了四十万册书^③，“八·一三”上海战事后由于经济来源断绝,东方图书馆的恢复工作陷于停顿。除了在重庆开办的分馆对外开放外,东方图书馆从整体上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部抄本《读史方輿纪要》也许是战火中侥幸遗存的旧四部之一,或者是复兴东方图书馆期间重新得到的图书。“一·二八”之后,张元济曾检视董理他此前存放在位于租界内的金城银行的涵芬楼善本,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但却没有著录这部抄本《读史方輿纪要》;胡道静先生《上海图书馆史》记载,商务印书馆曾分别于1911年、1913年、1923年编辑出版了《涵芬楼旧书分类总目》、《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和《涵芬楼志书目录》,可惜目前尚无法看到。但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后所附的《涵芬楼原存善本书目》中,一部《读史方輿纪要》也没有著录。如果张元济确实认为黄笈本《纪要》有很重要的价值,就不会对其漠然置之。因此只能大致推测说它就是东方图书馆在战火中侥幸保留下来的遗书,或者是在以后的复兴过程中陆续得到的藏书。

《张元济书札》没有注出张元济给顾廷龙写这封信的时间,但据顾廷龙先生《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所引张元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廿五日给顾廷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的时间不会早于1939年。又据《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曾于1948年前后致书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朱经农(1887-1951),称“东方图书馆存书异常凌乱,急应整理。”^④张元济给顾廷龙信中所说“东方提出所谓善本”云云,大概就是在1939年至1953年间东方图书馆整理其所藏时发生的事情。有材料介绍,归属于涵芬楼密藏于金城银行的部分善本古籍,连同恢复后的东方图书馆藏书,1953年由张元济捐赠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后转交北京图书馆珍藏^⑤。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现在所藏的这部黄笈本《纪要》,也许就是经由这样的渠道得来的。

张元济及涵芬楼对地方志收集工作的重视,是世人皆知的。张元济针对清末以来普通地方志不受重视的现实,态度鲜明地指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为尤重者。”^⑥张元济从民国初年就锐意收集全国的地方志,在他的坚持和影响下,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着手编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时,为了从方志中找到更全面的材料,又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大量收购和借抄方志。据胡道静先生《上海图书馆史》统计,当时海内外收藏中国地方志的机构主要有11家,排在前面的是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分别收藏方志3844种、2814种和2641种。东方图书馆所收地方志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共有2081种,该馆收藏1753种,占全部的84%,搜罗赅备,蔚成巨观。作为一家私营出版机构创办的图书馆,能收集到这么多的地方志,足见其经营者的重视程度。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虽然不是方志著作,但它阐述的也是各地的历史及地理情况,在内容和作用上与地方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张元济看到一部有特点的抄本时,便立刻对它产生了兴趣,并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经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全国古籍善本书目》都没有收录这部黄笺抄本,在编选者看来它尚够不上善本。煌煌70余万字的《顾廷龙文集》中,也没有一篇介绍该书的文章,顾先生1992年为影印《读史方輿纪要》稿本所写的序,仍对此书只字未提。张元济当年向顾先生极力介绍该书,并希望顾先生能做出进一步的审核。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现在竟然没有看到顾先生关于此事的片言只语的交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笔者重提此书,也意在引起图书馆界和学界的重视。

注:

①《张元济书札》(下)第89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 ②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 ③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1期。
- ④《张元济书札》(上)第34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 ⑤张翔:《张元济与涵芬楼》,《大学图书馆情报学刊》1998年第1期。
- ⑥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商务印书馆,1951年。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新书讯:古代石刻文献之全编

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全二册) 精装 16开 定价 600元

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全四册) 精装 16开 定价 1100元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全四册) 精装 16开 定价 1100元

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全三册) 精装 16开 定价 860元

明清石刻文献全编(全三册) 精装 16开 定价 860元

本书由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组编辑,编者查阅了现存的千余种金石志书(包括地方志中的金石志),经过认真对比去重,从中辑录出 17000 余篇石刻文字,从秦砖汉瓦到碑文墓志,上下两千年,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各个方面,集现存金石志书之大成。全书上下两栏,不仅影印各金石志书所录石刻文字,还附有历代金石学家撰写的考释文字。所用版本皆从国家图书馆丰富馆藏中优选而出。全书依时代分为五编,共计 16 册(见上)。编者精心制作了每编的目录和索引,目录置于该编第一册之首,索引则附于该编末一册之尾。读者既能有序利用,又可单种或多种购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现已面市。